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全国高校
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
重大课题项目

社会思潮论丛



新自由主义思潮

梅荣政 张晓红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全国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重大课题项目

社会思潮论丛

论新自由主义思潮

梅荣政 张晓红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内容简介

《论新自由主义思潮》一书，是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项目“社会思潮与高校德育研究”所属课题的最终成果。本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阐述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渊源、勃兴的历史背景和发展历程、主要流派及其基本观点，分析了新自由主义作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质，揭露了新自由主义的蔓延对当代世界的影响，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深重危害，着重评析了作为新自由主义变种的中国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回击了它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批判了它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宣扬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本书最后提出了深化新自由主义思潮研究，划清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界限的建议。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新自由主义思潮/梅荣政，张晓红著.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11

ISBN 7-04-015019-0

I. 论… II. ①梅…②张… III. 自由主义-研究
IV. D0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1478 号

策划编辑 马雷 责任编辑 蒋旭东 封面设计 刘晓翔
版式设计 王莹 责任校对 杨凤玲 责任印制 孔源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总 机 010-58581000

购书热线 010-64054588
免费咨询 8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东光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330 000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1.8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15019-0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许征帆 杨瑞森 梁 柱 钟哲明 张耀灿
梅荣政 焦国成 林 泰 李润海 刘书林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项目

“社会思潮与高校德育研究”课题负责人：刘书林

各子课题负责人：

论个人主义思潮	夏伟东	
论民族主义思潮	房 宁	王炳权
论新自由主义思潮	梅荣政	张晓红
论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刘书林	

目 录

导言	(1)	五、主张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模式	(125)
第一章 西方新自由主义谱系	(11)	六、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实质和危害	(127)
一、概念界定：自由、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	(11)	第五章 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政治理论评析	(132)
二、西方主流经济学流派的转换	(20)	一、攻击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	(132)
三、西方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	(22)	二、要求政治上与西方接轨	(135)
四、新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及其主要流派	(24)	三、诋毁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141)
第二章 新自由主义评析	(38)	四、鼓吹“告别革命”	(144)
一、新自由主义勃兴的背景及其蔓延的渠道	(38)	五、宣扬“腐败有利论”	(149)
二、新自由主义思潮对当代世界的影响	(47)	六、主张“政治多元化”	(158)
三、新自由主义最终衰落的命运	(74)	第六章 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文化理论评析	(162)
第三章 中国自由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84)	一、要求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162)
一、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中国自由主义	(84)	二、抹杀五四运动的历史作用	(170)
二、20世纪50—70年代末的中国自由主义	(89)	三、否定爱国主义精神	(172)
三、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自由主义	(92)	四、污蔑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176)
四、中国自由主义的显著特点	(98)	五、消解主导意识形态	(182)
第四章 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评析	(106)	六、宣扬“意识形态多元化”	(186)
一、皈依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方向	(106)	结束语	(197)
二、张扬“私有制优越论”	(110)	一、充分认识新自由主义的本质	(197)
三、提出所谓社会主义的“新构想”	(114)	二、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性	(201)
四、兜售非国有化和私有化的改革方案	(116)	三、大力弘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	(204)
		四、坚持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	(206)
		参考文献	(208)
		后记	(212)

导 言

本书是我们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项目所属课题的最终成果，该项目的总名称为“社会思潮与高校德育研究”，由教育部下达给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主持，包括多个子课题，本书“论新自由主义思潮”是其中一个子课题的研究成果。

列宁说过，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即是“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问题来说最主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① 遵循列宁讲的科学方法，本书首先对自由主义作了历史的考察。

自由主义自17世纪中叶在英国产生，19世纪初叶完成理论体系建构，长期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产生重大影响，是西方一种重要社会思潮。自由主义在几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大致经历了传统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两个时期。前一时期从17世纪起延续到19世纪末，后一时期则从19世纪末一直延续至今。古典自由主义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起过积极作用。它以英国为发源地，以约翰·洛克（John Locke）为“自由思想的始祖”，在理性基础上以个人自由、维护个性的发展为核心。洛克基于“天赋人权”论提出的自由权，含政治自由、财产自由和思想自由，主张政府的建立要得到人民的同意。1776年美国发表的《独立宣言》、1787年制定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和1791年生效的《权利法案》，是以政治纲领形式和法律形式确立并阐释自由主义原则的重要文件。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和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对此作出过重大贡献。1789年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涵盖了17世纪以来启蒙哲学、自然法思潮与自由主义的重要主张，它第一次扼要地以成文条例彰显了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成为18世纪自由主义宣言的典范。它连同法国的夏尔·路易·德·塞戎达·孟德斯鸠（Charles Louis de Selondat Montesquieu）阐述的自由与分权的思想，把自由主义的影响扩展到整个西方。

18世纪末至19世纪，英国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ituyate Mill）等自由主义思想家，适应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需要，围绕国家的经济问题，对个人自由和国家作用进行了论述。他们竭力倡导经济自由、契约自由和竞争自由，主张国家应奉行放任主义政策，不干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赋予个人以更大的自由余地。特别是亚当·斯密，他作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优秀代表，总结和进一步发展了配第的自然法、洛克的自然权利、诺思的自由贸易、重农学派的自由放任和自然秩序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

等经济自由观念，以人性论为出发点，建立了他的自然自由制度。他认为，人都有“利己心”，都是利己主义者，以此为理论基础得出经济自由、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主张，这在当时是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密尔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和危机，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观点进行了革新与修正，使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发生重大转折。他把关于自由的讨论扩展到了更为广阔的社会领域。他提出了个人自由与社会控制的界限，主张维护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由，主张有限度的放任主义，实行一定程度的国家干预。这就开始了由古典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过渡。

然而，古典自由主义一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发生资本主义大萧条之后才退居后台。因为这时西方一些政治家和理论家深切地感受到自由放任的理论政策不适应当时垄断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需要重新评价并克服自由放任主义理论给实践带来的危害，需要用新的理论和政策来取代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因此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新自由主义是指萌芽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20世纪二三十年形成的一种理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度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一种社会思潮。它适应当时高科技革命兴起、生产力巨大发展、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垄断发展等的需要，由理论、学术转向政治化，成为国家的一种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和政策主张。虽然它在20世纪90年代从西方国家的主导地位上跌落下来，但却被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用作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侵蚀、实施和平演变战略，对发展中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的理论武器和工具，在世界舞台上空前活跃，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迅速蔓延，成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霸占整个地球的最富有侵略性的工具。

新自由主义的分期，学界有不同的意见，按我们的看法，它萌芽于19世纪最后30年和20世纪初，这个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亚当·斯密等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所宣扬的自由放任和自由竞争，主张取消关税保护，要求给予生产活动和商业活动完全的自由，让“一只看不见的手”^①充分发挥作用，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调节，按照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古典自由主义反映的是17、18世纪进入青年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意愿，当时年轻的资产阶级感到封建君主制国家成为它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要求摆脱国家之手而自由地独立发展，并且显示出自立发展的信心。“斯密的自然自由制度的实质，是要求人们公开地承认社会应服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服从管理生产的人的统治，也就是要求使资产阶级取得不受限制和干涉的统治。”^②到19世纪末，古典自由主义的主张和政策已不适合垄断资产阶级的要求。因为它看不到事实上早已大量表现出来的市场机制作用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和破坏性，看不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即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看不到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干预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理论远远落后于现实。20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大萧条，表明古典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自行调节的历史性失败。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

①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27页。

② 吴易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吴易风文选》，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页。

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① 当时为适应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各种各样的理论竞相登场，新自由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理论的。1927年，奥地利的路德维希·冯·米瑟斯（Ludwig. Von. Mises）出版《自由主义》一书，宣扬资本主义和市场自由的普遍性，以诋毁社会主义和维护资本主义的鲜明观点阐发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在这同一时期，米瑟斯和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还挑起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大论战”，与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就社会主义制度的可行性问题进行论战，论战的焦点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是不是具有实行经济计算的可能性。以这场大辩论为标志，新自由主义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但是，米瑟斯的这一套理论在几十年内并未被社会普遍接受。其原因，一是当时欧美许多国家事实上都采纳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理论，把资本主义的市场体制与一定程度的国家干预相结合，走上了福利国家和国家干预主义的道路，而且取得了成效。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推行“新政”，暂时摆脱经济政治危机的若干经济政策，杜鲁门总统特别经济咨文，美国的莫莱充分就业法案（1945年）和就业法（1946年），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关于就业政策的白皮书，法国新宪法关于就业预算的规定，都是西方国家以凯恩斯主义为国策的突出表现。英国政府在二战期间接管经济，国家直接出面来干预经济生活，生产规模扩大，生产产品增多，提供了政府管理经济的成功经验，证明了国家计划调节的好处。20世纪50和60年代，西方国家的政府因奉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出现了20多年的经济繁荣时期。凯恩斯主义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效果，是因为凯恩斯经济学作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产物，是以西方社会现实中国家干预经济的措施和反危机的经济政策为依据形成的经济理论，正如美国凯恩斯主义者克莱因说的，凯恩斯“并不是先有理论再有实用政策，而是先有目的在于医治真正的经济病症的实用政策，再由此引申出他的理论。”^② 它适应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和20世纪30年代反危机的需要。二是这一时期，全球经济大都处于停滞状态，惟有苏联“风景这边独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英雄般”的成就。苏联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其建设成就迫使西方一些有见识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理智地看待苏联的制度，并从其现实的深刻思考中吸取有用的东西。

然而，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性是一个客观规律，绝不因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调整和经济暂时繁荣而消失。战后，由于西方国家经济重建引进社会主义国家成功的经验，对生产关系、劳资冲突的调节，加上第三世界国家廉价石油和原材料的供给，促进了社会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这并没有根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派生的各种矛盾，相反，矛盾愈积愈多。凯恩斯主义长期奉行以扩张性财政为基调的反危机政策，埋下了引发通货膨胀的祸根。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西方经济出现频繁的危机。70年代初，以中东战争为导火线，石油输出国组织联合实行石油限产、提价、禁运等政策，造成石油危机，导致西方经济增长陡降，几个发达国家进入以经济发展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高失业和高通货膨胀并发为特征的“滞胀”时期。以往，西方国家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并不“两高”并发，而通常是一高一低：通货膨胀率高时，失业率就低，反之亦然。对此，凯恩斯主义的应对措施是，用扩张性的财政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4页。

^② 克莱因：《凯恩斯的革命》，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36页。

政策和货币政策抑制高失业率，用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抑制高通货膨胀率，而这时面对的却是“滞胀”现象，即“两高”并存，以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为首的后凯恩斯经济学，无法解释、更无力消除这种现象，在理论上陷入了困境。

这里要指出的是，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起，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虽然没有被社会普遍接受，但是他们并没有放下自己的旗帜，而是一直坚持精心立说，在批评凯恩斯主义的过程中，着力雕琢自己的理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滞胀”危机的出现，凯恩斯主义陷入理论困境，新自由主义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两个主要流派领衔，迅速崛起。本来“滞胀”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日趋激化的产物，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新自由主义者却将其归结为凯恩斯主义的罪过。他们竭力论证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国家干预过度、政府投资过大、货币供给不足。更严重的是，许多社会主义因素混进了政府干预和福利国家政策之中，使工会力量过大和工人运动高涨，破坏了经济运行。新自由主义中的新古典经济学派从理论和政策全面地批判凯恩斯主义，对其“清单上的每一项目都提出了反对意见”^①。宣布凯恩斯主义是应当抛弃的过时的错误理论。他们认为，要消除危机，就要削弱工会的力量和严格控制货币总量；节省财政开支，压缩福利开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因为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无论在短期内还是在长期内都是无效的。凯恩斯主义失灵，显得无力回天，结束了它在西方经济学中长达20多年的独领风骚的历史。新自由主义倡导的观点，如经济自由化，反对政府调节通货等，正对垄断资产阶级稳定经济的胃口，得到西方大财团、大资本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的鼎力支持。在这种强力的支持和操纵下，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初发展起来，在80年代扶摇直上，由理论、学术跃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国家意识形态，成为一股国际性思潮。

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社会主义运动暂时处于低潮，世界科技的巨大进步，特别是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西方跨国公司在国际经济政治事务中的影响日趋增强，经济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这种新的国际局势给新自由主义带来发展机遇。它在美国的经济利益和整个西方商业利益的驱动下，迎合国际垄断资本和大金融寡头谋求世界霸权的需要，借助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达成的、以恢复自由放任市场经济政策、放弃政府干预和推行私有化为主旨的“华盛顿共识”，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蔓延。“从此，新自由主义由学术理论而国家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和范式化”^②。此后，智利、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秘鲁等国，谋求国家发展，均以新自由主义为国家发展的理论指导，拉丁美洲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的试验场。在苏东国家，新自由主义取得了支配地位，政要们把取缔共产党、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同西方经济一体化作为基本国策。

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作为风靡西方世界的重要思潮，越来越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干预世界经济活动和政治秩序的重要手段。进入21世纪，在西方大国谋求控制世界的过程中，新自由主义的作用仍然受到重视。现在西方具有重要影响的主要流派有：以奥地利籍英国学者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为代表的伦敦学派、以美国芝加哥大

^① A. S. 布林德：《争论中的宏观经济学》，伦敦惠顿斯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03页。

^② 中国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新自由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6期。

学经济学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为代表的现代货币学派、以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ali Coase）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以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和以拉弗（Arthur B. Laffer）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等等。

如何评估新自由主义的问题，在本书正文中充分展开了我们的观点。这里，作为本书的导言，只能概括地讲一下我们总的看法。应该说，新自由主义流派在提出和论证自己的理论观点时，在理论思维方面也提供了某些有启发性的东西，包含着某些合理因素。特别是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的新自由主义，源于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其中不乏科学成分，有的思想还具有一定的深刻性。如某些自由派学者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批评，关于一般市场机制的研究，关于减少政府干预、压缩政府开支、提高政府效率的观点，关于实行积极财政政策 and 货币政策、加强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的观点，关于人的心理预期对经济活动和经济政策影响的观点，关于加强法制、社会保障制度、稳定物价在市场经济中作用的观点等等，这些思想对于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可供批判性参考和借鉴的成分。但是从总体上说，新自由主义是为现阶段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经济和政治根本利益服务的资产阶级思想理论，本质上是十分庸俗的东西。

本书对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脉络、阶段划分、主要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观点都有专章介绍，但这不是本书的主旨。本书定名为“论新自由主义思潮”，意将文章做在划清思想界限上。之所以如此，不仅在于有关新自由主义的介绍，西方经济学说、西方政治学说和有关辞书已经讲得不少，本书在这样短的篇幅内也无法作更详细的介绍，而且在于研究的任务本身。我们撰著的目的是通过对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研究，揭露新自由主义对当代世界、特别是中国的渗透和危害，以划清思想界限。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新东欧经济学乃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翻版，它竭力主张用私有制加自由放任和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模式取代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以东欧经济学为指导的改革方案，主张实现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特别是取消国家对价格、进出口和汇率的管理，实现价格放开、进出口自由和货币按市场汇率自由兑换。积极争取与西方经济的融合，实现同西方经济特别是同欧共体经济一体化，不惜代价，竭力争取西方的经济援助，将西方经济援助视为苏联、东欧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不可或缺的前提等等，这种理论实施的结果造成了苏东国家经济大幅度滑坡、通货恶性膨胀，国家分裂，社会动乱，执政党更迭，人民蒙受苦难的严重后果^①。

阿根廷等拉美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十几年，其后果也十分严重。阿根廷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最大限度地取消了政府的经济干预，彻底实行私有化，国家退出了社会和国民经济的基础领域，中止了对这些领域的政府公共投资。阿根廷还遵循国际货币基金的“零赤字条件”，即政府将竭尽全力确保偿还阿根廷所欠西方的债务。倘若由于经济衰退导致了政府税收的下降，政府不得采取财政赤字手段来弥补公共开支的不足，必须通过压缩行政和社会保障的开支来维持国家经济的运行，将削减下来的开支资金用于偿还外债的本息。

阿根廷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结果，一是期望依靠一次性出售国有资产来填补社会保障体

^① 参见梁柱、张守民主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四项基本原则》，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9~221页。

系窟窿的愿望未能实现，而且国有企业被私有企业或跨国公司收购后，大批工人遭到解雇，社会失业不断增长，贫困人数不断增加，整个社会经济陷入了极度的混乱。二是大量社会财富流失海外。在阿根廷的金融危机中，控制阿根廷金融命脉的跨国公司不仅廉价收购国有、私营企业和自然资源，而且非法席卷老百姓的存款，金额达数百亿美元。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拥有的存款、股票损失惨重，大批公务员的工资、医疗保险、养老保障等也因银行冻结存款几乎无法发放。三是陷入不能自拔的外债泥潭。阿根廷按新自由主义的要求，盲目开放，大搞国有企业私有化并开放各个行业，经济命脉控制权落入美国之手，不得不一步步踏入外债圈套。1980年阿根廷的外债为270亿美元，1990年为600亿美元，2001年为1420亿美元。20年来阿根廷共偿还了外债本息1200亿美元，但外债仍膨胀到最初的4.5倍。这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实行资本市场自由化，允许西方金融资本自由进出，一旦外债流出造成经济危机压力时，国际货币基金就要求这些国家大幅度提高利率，经常达到30%、50%甚至80%的高利贷水平，这当然就会耗光这些国家的财富。四是诱感官僚腐败。在私有化过程中，削价出售国有资产的回扣率达10%，数亿美元的项目意味着数千万美元的回扣，这就会诱感官僚出卖本国利益充当买办^①。阿根廷按照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行事，吞下了苦果，其他推行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的国家也大致相仿。如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1998年的东南亚和俄罗斯金融危机，都是采纳新自由主义，受到国际金融资本破坏的表现。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通过其代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推行新自由主义，毁灭了苏东地区和拉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体制，侵吞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多年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把它们沦为少数发达国家的原料供应地、商品倾销场、危害环境的生产地和资本投机场所，致使其广大人民群众失去社会保障，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大多数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少数人成为暴富者。这种事实向我们提出警告：必须识别新自由主义的真面目，避免落入其陷阱。

在中国，近代以来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就有一定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的国际政治背景和某种理论背景下，某些学者更乐于接受和传播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应该指出，这时在我国得到较广泛传播和讨论的新自由主义，已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学术，而是作为一种应当借鉴的经济范式和政治纲领加以鼓吹。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经济学和社会哲学这一类的学术思想上，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大都不过是在拾国际上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牙慧而已，而且他们捡来的多半都是其中最肤浅的说法。”“但是，决不能因此就把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看成是外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简单翻版。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在国际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共同理念之外，加上了许多自己的特殊创造，因而形成了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自己的特点。”^②他们喜欢引用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信条，然而他们“并没有全面地吸收和继承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全部理论体系。它对西方主流经济学采取的是‘各取所需、为我所用’的态度，只援引自己喜欢的论点，而回避甚至闭口不提那些它不喜欢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要思想观点”^③。这种评论是有道理的。

① 参见杨斌：《从国有股减持被停止看其理论缺陷》，《高校理论战线》2002年第10期。

② 左大培：《混乱的经济学——经济学到底教给了我们什么？》，石油工业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③ 左大培：《混乱的经济学——经济学到底教给了我们什么？》，石油工业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中国新自由主义思潮通过文献出版物、各种论坛讲坛、研究机构的学术讨论等渠道和方式进行传播，产生了恶劣影响。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思潮为了改变中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干扰其社会主义方向，其代表人物提出了一系列严重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主张。在经济理论上，他们皈依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方向，坚持资本主义改革开放观，大力鼓吹“私有制优越论”，主张按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取消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推进私有化的改革方案，改变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起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政治理论上，他们提出实行西方总统制、推行两院制、删除宪法序言、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条款等等全盘西化的主张，企图从根本上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否定我国的国体和政体，企图改变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建立起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在思想文化上，他们以理论探索和创新之名，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把攻击矛头直指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提出要“告别革命”，企图通过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否定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历史，鼓吹“意识形态多元化”，达到消解我们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的目的。他们特别起劲地宣扬新闻媒体应成为“社会武器”，成为制衡党和政府的“第四权力”，实质上是要否定新闻媒体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性质，否定新闻的党性原则，反对党对新闻媒体的领导和管理，企图把思想文化领域的演变作为他们进行政治经济演变的前奏。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亦即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它不仅是一种经济自由主义，其思想理论还包括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内容。正是由于它的代表人物热衷于兜售已被西方大国政治化了的新自由主义，严重地干扰着我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和政策，扰乱了一些人的思想，在一些方面造成了严重危害。

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① 他还说：“我们的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② “我们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增加全民所得。我们……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③ 他强调：“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④ 他又说：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实际上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立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做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⑤

事情正如邓小平同志所预见的，由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渗透和影响，关于中国改革方向道路的争论现在更激烈了。某些热衷于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人，把邓小平同志的警言抛得远远的，置四项基本原则于不顾，竭力掩盖新自由主义在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造成危害的真相，从多方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页。

④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页。

面攻击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危害日渐彰显。坚持新自由主义立场的人，干扰我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鼓吹全盘私有化、完全自由放任。他们的一个重要借口就是，现在实行市场经济，必须同西方经济接轨。其实这种辩解是站不住脚的。一是即使是西方国家，在实行市场经济时也不同程度上主张国家的宏观调控，而不是完全的自由放任，现在西方大国的政府在本国内并不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正当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国家干预主义的批判盛行的时候，一个新的主张国家干预的学派，即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就应时而起。该学派把传统的微观经济学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结合起来，为宏观经济学提供微观基础。新凯恩斯主义虽然抛弃了原凯恩斯主义的某些旧观点，诸如经济当事人不以追求最大化为目标和适应性预期的观点，但是本质上仍然坚持原凯恩斯主义的基本观点，它基于市场失灵的结论，认为如果没有政府干预，经济恢复均衡将是一个漫长的痛苦过程，失业（或）通货膨胀将更为恶化。与此相应，它强调政府干预经济政策的有效性。新凯恩斯主义关于政府干预经济的学说受到西方国家的政府的重视，而且愿意接受。同时，新凯恩斯主义也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正如一些学者在肯定国家调节论时指出的：“今天，没有一个市场经济不受到国家和政府机构的带有或多或少强制性的指导。”^①“没有国家管理的市场将导致二元的、甚至四分五裂的社会，它不仅会埋葬市场经济，使市场成为万恶之源，而且还会使自由遭到毁灭。”^②所以，西方大国的政府主要是将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用于对付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二是中国实行的市场经济与西方社会的市场经济根本不同。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③它既要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又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如江泽民同志所强调的，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方向，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④党的十五大的报告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⑤这段论述表明，在我国具体条件下，市场经济既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又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实现形式。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实现形式，在其丰富的内涵和多方面的内在要求中，社会主义的质的规定性是非常明确的。显然，我国坚持新自由主义立场的人制造的借口是经不起反驳的。但是他们的种种言论却起着混淆视听、搅乱理论是非的作用。我们正是基于上述种种原

① 勃拉顿：《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思想》1991年第3~4期。

② 罗奈·勒努阿：《没有国家的市场？》，《政治学》1992年第1期。

③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3页。

④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

⑤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因，决定把本书的重点放在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分析上面，以期通过评析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一些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观点，划清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界限，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

在中国，称赞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人大致有四种情况。一是以新自由主义的代表自居，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敌，并散布大量言论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人。二是如我国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权威学者、北京大学的陈岱孙教授早在1983年所预言的，由于多年的隔绝，一些人对西方经济十分陌生，一旦接触，不免引起目眩，以致对其“不加审别的推崇”。这也许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渡现象^①。三是仅把新自由主义视为西方一种经济理论和学术观点进行研究，未从政治的高度看到，“华盛顿共识”之后，西方新自由主义已经国家意识形态化，成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以及它对世界经济政治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四是某些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力求探索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思路、新举措，但由于思想理论水平不高，解决复杂矛盾的能力有限，结果就不加分析地把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当作了良方。我们在本书中批判的是第一种人。对于第二、三、四种人，我们希望同他们平等地讨论商榷问题。

本书的结构是，在导言之后，用二章介绍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沿革、主要流派、代表人物和对世界的影响（第一、二章），用一章介绍中国自由主义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第三章），用三章分别评析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基本理论观点（第四、五、六章），最后用“结束语”的形式，论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在反对自由主义斗争中的历史责任。

这里要说明的是，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文献，借鉴了许多前人的优秀成果，这包括理论观点，也包括重要资料，还包括某些理论思路，对借鉴的成果，我们或者直接加以引用，注明出处，或者加以转述，注明参见书目、论文题目和期刊，或者加以综合，有的注明出处，有的注明参考文献，列在本书的后面。这里，我们向各位著者表示衷心感谢。本书对某些自由主义的观点进行了分析，我们的目的在于划清思想界限，并非针对个人，故我们没有一一指出这些观点的出处。

邓小平同志早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论到“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时，讲过一番很深刻的话。他说：我们一定要“使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现在有些错误观点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的则公然向马克思主义挑战。对此，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思想战线的共产党员，特别是这方面担负领导责任的和有影响的共产党员，必须站在斗争的前列。”^②他还指出：“毛泽东同志说过：‘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有些人把‘双百’方针理解为鸣放绝对自由，甚至只让错误的东西放，不让马克思主义争。这还叫什么百家争鸣？这就把‘双百’方针这个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歪曲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方针了。毛泽东同志的《反对自由主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好文章。建议各级领导同志，特别是思想战线的同志认真学习一下，并且

① 陈岱孙：《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页。

按照文章的精神办事。”^①

邓小平同志讲这番话的时间过去 20 多年了，但是它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党要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②。要求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持抵制腐朽文化。”^③现在，坚持对新自由主义进行科学评析，正是践行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战略任务的重要方面。对此，我们不能有任何的懈怠！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7 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7 页。

③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7 页。

第一章

西方新自由主义谱系

自由主义作为西方国家的主流思想，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其基本观点虽然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几经调整和改变，形态多有翻新，但坚持个人主义，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始终是它的主脉。萌芽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理论的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也历经戏剧性进程，但由于它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政治生活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和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曾经是大多数西方国家制定国策和统治方略的理论基础。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盛行。为了透彻了解中国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要观点和价值取向，揭露它的政治、经济、文化要求的实质，有必要对其理论来源、主要内容和现实基础做出科学分析，也很有必要对“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的相关概念及理论派别做出分析。

一、概念界定：自由、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

在西方语言背景下，对自由、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等概念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和界定。为了给全书分析自由主义思想提供明确的概念和理论框架，进而较为系统地把握中国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发展特点，我们的分析就从区分这些概念入手，继而对自由主义的流派做大致分类。

■ 1. 自由

自由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其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希腊的思想先驱苏格拉底（Socrates）、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已论说过有关“自由”、“自愿”的思想，罗马时期更有一些学派进行了关于人的欲望与自由关系的讨论。在这个时期关于自由的主

要观点是自然法思想、人的精神自由思想、人人平等思想。这表现在反对专制独裁，争取参与公共事务的斗争上，是一种权利的觉醒，由此形成了“公民意识”（citizenship）。

关于自由一词的最早使用，有多种说法，一说是1707年英国坎特伯雷主教首次使用，一说是源于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自由贸易”等用语。究竟何人最先使用这一概念，有待进一步做文献考证。但无论名称来源如何，资产阶级学者谈论“自由”的宗旨是明确的：确立和维护能够保障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制度，即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和民主制度。

什么是自由？初看起来，似乎不难理解。把自由二字拆开，“自”意味着自己，“由”意味着听从、顺随。把“自”和“由”联结起来的，“自由”即意味着听从自己的意愿。然而，一旦翻开人类思想史，进入学术领域了解“自由”的内涵，就会惊人地发现，颂扬自由的思想家们对究竟什么是自由，一直众说纷纭。

1979年上海出版的《辞海》对“自由”作了这样的解释：“（1）在政治上，自由这一概念有其阶级内容和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在古罗马，自由的原意指从被束缚、被虐待中解脱出来。资产阶级革命时提出的自由，其内容是‘个性解放’、‘政治自由’、‘贸易自由’等等，目的是从封建主手里夺取政权，建立自由竞争的资本王国。在剥削制度下，只有剥削阶级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自由，没有劳动人民反剥削、反压迫的自由。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才获得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并得到法律的、物质的保障。自由是对纪律而言，它们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的侧面，人民既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纪律约束自己。（2）在哲学上，自由是指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3）自己能做主。”^①

《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对自由是这样解释的：“自由”是：“（1）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随自己意志活动的权利。（2）哲学上把人认识了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自觉地运用到实践中去，叫做自由。（3）不受拘束；不受限制。”^②

以上不同辞书表明，在中文里，自由是在不同意义上被定义的。一般说来，自由可以作法律、哲学和政治学意义上的区分。在哲学和法律上，自由的内涵比较确定。但是作为政治意义上的自由，迄今仍然是众说纷纭。但是比较公认的观点是，自由的概念是制约概念的对称，是相对于被奴役、专制而言的，往往指人们所具有的某种权利，如言论自由、契约自由和贸易自由等。自由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自由观。要弄清楚自由的内涵，首先就要弄清楚在特定场合所指的对象。

在西方语言中，“自由”（liberty）概念的意涵相当复杂。英国著名哲学家、政治思想家伊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在其著的《自由四论》中对“自由”的意涵作过统计。他认为，按思想史家们的不同理解，“自由”这个词竟有二百多种意涵^③。而且由于各种界定常常互相抵牾，理解的差异颇大。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安东尼·德·亚塞（Anthony De Jasay）在其《重申自由主义》一书中指出，这是因为“自由这个概念可塑性是十分大的。种种可以

^① 参见《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1893页。

^② 参见《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669页。

^③ 参见伯林：《自由四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第226页。